



贺麟与唐君毅 ——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与学术思想
(2007-7-30 11:19:28)

作者：彭华

摘要：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、哲学史、学术史，大师巨子辈出；四川籍的哲学家、哲学史家——贺麟与唐君毅，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，并且同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。二人有颇多惊人相似之点，也有巨大差异之处。本文从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、思想发展历程及时代际遇等层面比较二人之同与异，并略陈感想一二。

关键词：贺麟；唐君毅；人生经历；社会交往；学术思想

中图分类号：B261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1-5365(2006)08-0001-06

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、哲学史、学术史，大师巨子、鸿儒大哲可谓不绝如缕，一时呈现出群星璀璨的辉煌局面。四川籍的哲学家、哲学史家——贺麟与唐君毅，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。

他们二人有颇多惊人相似之点，也有巨大差异之处；将他们二人加以比较，不但可凸显那一时代之总体特色，亦可昭显个人之独有特色，而比较是发人深思的、也是予人启迪的。

对于这两位成就卓著的学者、建树丰伟的思想家，本文无暇全盘评价，仅撷拾其一二稍加比较，略陈管见数点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生平及其交往

就籍贯而言，贺麟与唐君毅虽然同为四川人，但在具体地望上却有所不同。贺麟出生于金堂县五凤乡杨柳沟村，该地位于成都平原，千里沱江之首，那里恰好是四川的腹心地带，堪称正宗的“天府之国”^①。而唐君毅的家世则具有“客家”色彩，唐君毅的先世是广东五华人，六世祖以岁荒迁徙至四川省南部的宜宾县柏溪镇普安乡，以糖工起家；后于金沙江畔置地产业农，遂为四川宜宾县人。唐君毅柏溪之老家，距金沙江只有数十丈，出门便可遥望江水，对岸是绵亘的青山，有“东去江声流汨汨，南来山色莽苍苍”^②之胜。孔子说“知者乐水，智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子贡说“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；贺麟和唐君毅都属于“仁且知”（智）者，而唐君毅尤其典型。

虽然同为四川人，但两人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都不是在四川度过的。贺麟于1919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（清华大学的前身），随后便很少回四川长期居住。唐君毅于1925年毕业于重庆联中，随即北上北京、南下南京读书；其后，除抗战期间在重庆执教外，唐君毅便极少驻足巴蜀了；1949年6月，唐君毅和钱穆移居香港，终其后生便以海外游子身份客居港台异乡，直至埋骨台北^③。唐君毅虽然大半生离乡在外，但对家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他在《怀乡记》说：“为了我自己，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，先父的墓上，祖宗的墓上，与神位前，进进香，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，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水，亦就可以满足了。”[1]（603）

就生命历程而言，贺麟虽然年长唐君毅不足七岁，但寿命却比唐君毅长了二十一个年头。贺麟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（1902年9月20日），卒于1992年9月23日，享年90岁，堪称耄耋高寿。唐君毅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（1909年1月17日），卒于1978年2月2日，仅仅享年六十九岁（虚岁七十），未足古稀之年。唐君毅的门生弟子、亲朋故友扼腕叹息，若天假以年，其贡献更不可限量。

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，出生年月不同，但都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，而且他们的早期教育都来自家庭。贺麟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，毕业于金堂正精书院，曾主持过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——当过金堂中学校长、县教育局科长；居家期间，贺松云常教贺麟读《朱子语类》和《传习录》。唐君毅幼年读书，皆由母教。两岁时，即由母亲陈大任

(1887—1964)教以识字。随后,又由乃父唐迪风(1886—1931)教读《老子》、唐诗、司空图《诗品》,又命其背诵《说文解字》。早期良好的传统教育,给他们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,为日后“会通”中西(印)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④。

但就西学之“习得”(learn)而言,贺、唐二人却有着天壤之别。贺麟之接触西学,初始于清华学堂;而其濡染西学,则有着“直捣黄龙的气魄”[2](24)——直接负笈西洋求取“真经”。1926年,贺麟自清华大学毕业,随即远涉重洋赴美求学。他先插班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,1928年毕业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。同年9月,贺麟转入哈佛大学,“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”[3](161)。1929年,贺麟毕业于哈佛大学,获哲学硕士学位。次年夏,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,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,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。1931年8月,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,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。

在唐君毅的生平履历表上,从未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。唐君毅西学之习得,部分来自先贤师辈的课堂传授和课后交流,而大部分来自个人的勤奋自修和慧思领悟。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,唐君毅的老师有熊十力、汤用彤、张东荪、金岳霖诸先生。转读南京东南大学(后改名为中央大学)哲学系时,唐君毅的老师有方东美、宗白华等,并常往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处请教。和诸多现代新儒家大师一样,唐君毅以西方哲学研究为其学问的起点。他最初对英美的新实在论颇感兴趣,后转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;唐氏自陈,“三十岁左右,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,这真是始料所不及。由此再来看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,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,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”[4](571)。

这两位四川籍的哲学家,其早期的人生轨迹一如两条平行线,各自发展而无接触;进入中期以后,二线方峰回路转般的交叉了。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,他们人生的交往当初始于抗日战争时期。四十年代初,唐君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,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⑤。而二人思想的交流,则可追溯至三十年代末。贺麟在1938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我读《重光杂志》中唐君毅的文章,觉得唐君的文字明晰,见解弘通,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。其治学态度、述学方法、所研究之问题,均与余相近似,是基于‘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’的原则。”[5](201—202)1945年,贺麟又在《当代中国哲学》中评价了唐君毅及其《人生之路》,认为“唐君毅先生不仅唯心论色彩浓厚,而他的著作有时且富于诗意”,并且指出唐君毅“讨论自我生长之途程,多少有似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”[2](46),而《人生之路》便是“根据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”[2](114—115)。

唐君毅1978年归隐道山之后,贺麟仍然深情不忘唐君毅。1980年,贺麟发表《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》一文,特意提及唐君毅之《人生之路》,“这是他根据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。但对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有一定帮助……。唐君毅是香港、台湾、扬名海外的伟大之哲学家,著作等身,门弟子很多,传继其学派。可惜已于一九七八年逝世”;接着又提到了唐君毅的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,“他最重要,也是他集大成的著作作为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,是二千多页的两巨册”;贺麟还提及自己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,“我曾写了一篇‘唐君毅先生的早期思想’作为他廿八卷本的‘读后感言’,并曾于一九八四年,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”⑥。1983年秋冬(10月至11月),贺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至港讲学一月。讲学内容包括黑格尔哲学、宋明理学,讲稿发表于《求索》1985年第1期。在港讲学期间,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贺麟前去府上瞻仰唐君毅的遗物,并在九龙设宴款待,由唐君毅的入室弟子李杜、唐端正、陈特及霍韬晦等作陪。李杜等均以著作相赠,谢廷光并以唐君毅的主要著作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一套相赠(后谢廷光又曾两度前往北京,贺麟和周辅成予以热情接待)[5](201)。回来后,贺麟撰写了《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》一文(后收入《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》),谈论唐君毅的早期思想以及他们二人在思想上、精神上相契合之处,以为纪念。

二、思想发展历程及其时代际遇

众所周知,新儒家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之所以能超越前人,是因为他们在沉潜浸淫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同时,又能深入探讨西方思想并与之相参照比勘。新儒家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是国学巨擘,在西学方面亦堪称大家。如贺麟、唐君毅之于黑格尔哲学的深造自得,牟宗三之于康德哲学的精深研究及在此基础上所达致的创造性成果,均为世界所公认,而且都足以傲视学林。

贺麟自回国之后,便开始了“儒化”/“华化”(借用贺麟语)的过程,译介西学(斯宾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等),阐释国学,构建体系;最终“会通”中西,赫然而为一代哲学大家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新心学”哲学思想。他在40年代先后出版的《近代唯心论简释》(1942)、《当代中国哲学》(1945)(后易名为《五十年来来的中国哲学》)、《文化与人生》(1947)等著作,就是反映其“新心学”哲学思想的代表作,并因此而奠定了他“新儒家”

学者的地位。相较于梁漱溟的“新孔学”、熊十力的“新唯识论”、冯友兰的“新理学”而言，贺麟的“新心学”在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中是比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，它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。“新心学”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它在新儒学的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或许正因其晚出，因而能对此前的新儒学思潮作出公正而恰当的评判和总结，因而能合理地吸收他人（家）的经验与教训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理论缺陷，从而使“新心学”的面貌与其他新儒学颇为不同，而且更具圆融色彩⑦。

贺麟学贯中西，在中西哲学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，《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》（1984）、《黑格尔哲学讲演集》（1986）是贺麟治西方哲学的重要成果。1986年出版的《黑格尔哲学讲演集》，评论界认为“这是迄今为止黑格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